

刘中文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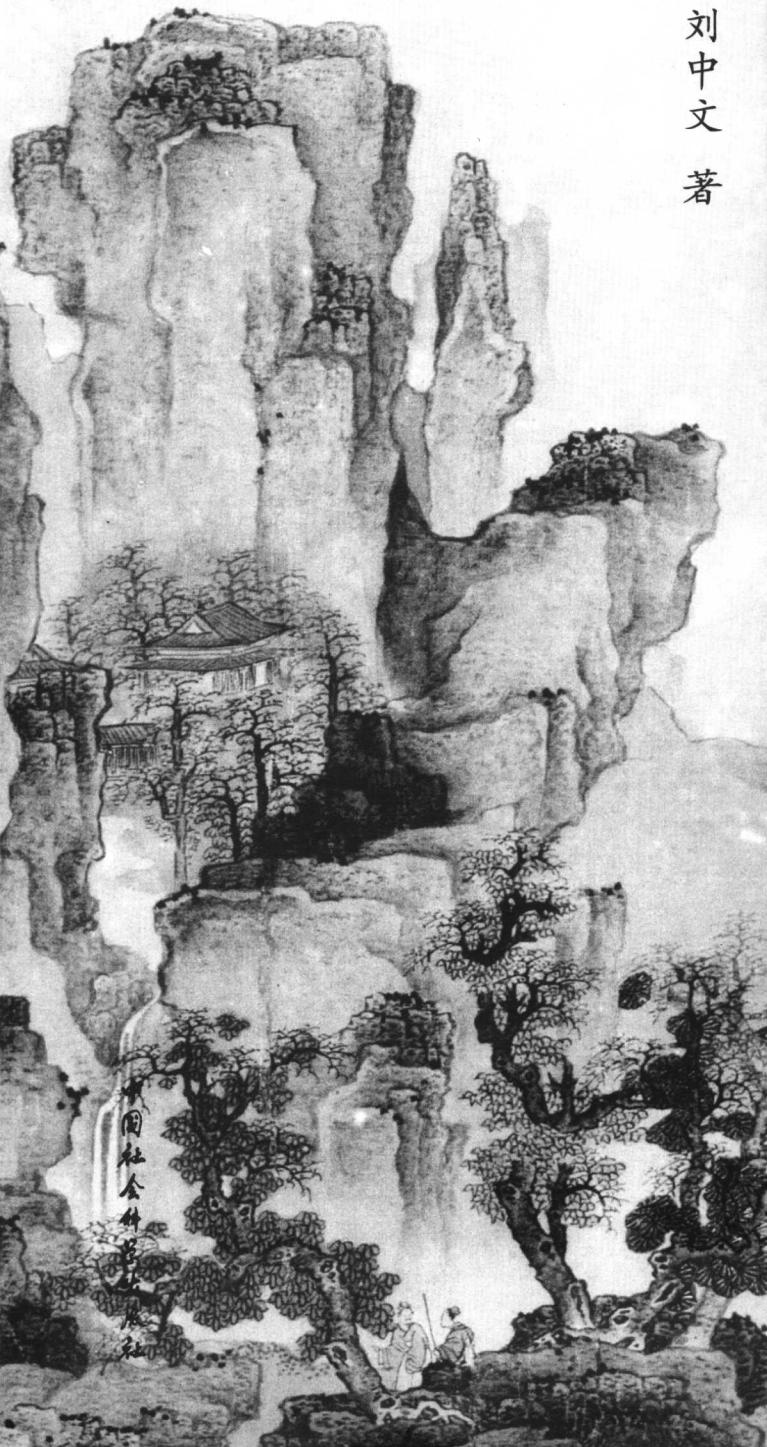
唐代陶渊明接受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刘中文 著

唐代陶湖明挂堂研究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唐代陶渊明接受研究/刘中文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7

ISBN 7-5004-5684-0

I. 唐… II. 刘… III. ①陶渊明 (365~427) —人物研究②唐诗—文学研究③古典散文—文学研究—中国—唐代 IV. ① K825.6②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62584 号

责任编辑 周晓慧

责任校对 林福国

封面设计 王 华

版式设计 李 建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装 订 丰华装订厂

版 次 2006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12.25 插 页 2

字 数 290 千字

定 价 2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邹进先

陶渊明在生前是寂寞的。而其死后，他的人格精神、生存方式、价值观念、处世态度、审美情趣和诗艺创作，则受到历代士人们持久不衰的关注，得到不断深入的理解与阐释，对中国士人的精神世界与文学创作产生了长久而巨大的影响。杜甫诗云：“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这两句诗也可以作为陶渊明生前与身后的概括写照。

王国维《文学小言》说“屈子之后，文学上之雄者，渊明其尤也”，是符合历史实际的。而且，作为“文学上之雄者”，陶渊明的意义与影响，具有不同于屈原的独特的思想与文学价值。正如本书作者所指出的：“近一千六百年来，陶渊明真醇笃厚、仁爱宽和的性情，‘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气节操守和人格精神，遗世独立、躬耕田园的生存方式，委运任化、超脱旷达、安贫乐道的人生态度，悠然自适、诗酒风流、啸傲田园的隐逸情趣，以及作为他的艺术独创的田园诗的真率自然、清新朴茂、静穆高远的艺术范式与审美境界等等，一直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士人的价值观念、人格精神、生存方式、处世态度，深刻地影响着中国诗歌的发展，形成了中国历史上令人瞩目、引人思索的重要文化文学景

观。五柳先生陶渊明和三闾大夫屈原各自的人生模式与诗学精神对后世的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形成了中国古代诗歌史上分别以儒、道精神为主要旨归的两条明晰的接受线索，这是中国诗歌发展的重要现象。比较而言，在某些历史时期，中国士人对陶渊明的接受远比对屈原的接受复杂得多。”

本书作者正是从这样的宏阔视野与整体观照出发，运用现代阐释学与接受美学的理论与方法，全面认真地搜集唐人阐释、承继、吸收、发扬陶渊明精神的各种史料，深入细致地辨析唐人诗歌中继承与发扬陶诗艺术精神与诗艺传统的各种表现，按照唐诗的历史发展线索，全面而有重点地描述了唐人对陶渊明思想与艺术接受的历史与特点，阐述了陶诗与唐诗之间复杂的、深层的关系，展现了唐人宏放的、复杂的精神世界。这一研究成果，对于认识陶诗的价值，认识唐诗思想艺术的形成，认识唐代士人的思想心态，认识中国古代诗歌发展的历史规律，无疑是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思想启迪意义的。作者立论谨慎，力求论从史出，不凌空架言，体现了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与良好学风。我为刘中文同志在攻读博士学位的三年时间中取得的学术进步与学术成果感到由衷的高兴。

唐人对陶渊明的阐释与接受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据我所知，近年来有好多位学人也在深入地思索与探究历代特别是唐宋时期的陶渊明接受问题。根据现代阐释学和接受美学的原理，文学文本的阐释天地无限宽广，文学文本的意义与价值在被阐释过程中不断地生成，从而对文学接受的历史的认识与阐释也会不断地有所前进，有所发明，展现出人类对过去时代的文学现象、文学历史的理性认识与审美感受的复杂性与丰富性。对于文学发展历史的描述，通常是按照时间历程顺流而下；而其对每一时期或某种文学现象的研究，又需要沿波讨源。对于后代的文学现象的

深入探讨，又会进一步加深对此前相关文学现象的认识。刘中文同志还计划撰写关于宋代陶渊明接受史的研究著作，我想，随着他对陶渊明认识的深化，随着他对宋代陶渊明接受史研究的深入和成果的形成，他对唐代陶渊明接受史的认识也将会有新的创获。这是可以期待与相信的。

2005年10月

目 录

序	邹进先 (1)
绪论.....	(1)
第一章 唐前的陶渊明接受	(18)
概况	(18)
第一节 颜延之：对陶渊明的第一阅读	(23)
第二节 沈约、江淹对陶渊明的认知	(30)
第三节 钟嵘、萧统对陶渊明的阐释	(39)
第四节 阳休之、庾信与陶渊明	(62)
第二章 初唐时期的陶渊明接受	(66)
概况	(66)
第一节 王绩对陶渊明的心仪与效法	(70)
第二节 “四杰”、沈、宋对陶渊明的标榜.....	(86)
第三章 盛唐时期的陶渊明接受	(99)
概况	(99)
第一节 孟浩然的陶家趣.....	(115)

第二节 王维的诗歌境界与陶渊明.....	(126)
第三节 储光羲与陶渊明的田园诗.....	(147)
第四节 李白对陶渊明人格与诗品的高扬.....	(160)
第五节 杜甫及其田家诗与陶渊明.....	(176)
第四章 中唐时期的陶渊明接受.....	(194)
概况.....	(194)
第一节 大历诗人对陶渊明的摄取.....	(204)
第二节 韦应物与陶诗.....	(221)
第三节 白居易对陶渊明的改塑.....	(244)
第五章 晚唐五代时期的陶渊明接受.....	(279)
第六章 唐代陶渊明接受补论.....	(297)
第一节 菊篱.....	(297)
第二节 五柳.....	(311)
第三节 桃源.....	(319)
第四节 效陶诗和陶诗.....	(338)
主要参考文献.....	(363)
后记.....	(379)

绪 论

刘勰在论及屈原时说：“自《九怀》以下，逮蹑其迹。而屈、宋逸步，莫之能追。……是以枚、贾追风以入丽，马、扬沿波而得奇。其衣被词人，非一代也。故才高者菀其鸿裁，中巧者猎其艳辞，吟讽者衍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1]屈原志远节高、特立独行、心怀宗国、九死不悔的人格精神和恣纵激荡、精彩绝艳的诗篇，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巨大而深远，历代文学家以其各自的期待视野予以接受，从中汲取人生与艺术的营养。屈原执著的儒家精神、卓绝的人格力量和瑰句丽辞的诗歌已经成为沾溉中国诗歌的重要一端。在中国文学史上，还有一位“衣被词人，非一代也”的诗人，他就是陶渊明。

王国维先生说：“屈子之后，文学上之雄者，渊明其尤也。”^[2]近一千六百年来，陶渊明真醇笃厚、仁爱宽和的性情，“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气节操守和人格精神，遗世独立、躬耕田园的生存方式，委运任化、超脱旷达、安贫乐道的人生态度，悠然自适、诗酒风流、啸傲田园的隐逸情趣，以及作为他的艺术独创的田园诗的真率自然、清新朴茂、静穆高远的艺术范式与审美境界等等，一直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士人的价值观念、人格精神、生存方式、处世态度，深刻地影响着中国诗歌的发展，形成了中国历史上令人瞩目、引人思索的重要文化文学景观。五柳先生陶渊明和

三闾大夫屈原各自的人生模式与诗学精神对后世的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形成了中国古代诗歌史上分别以儒、道精神为主要旨归的两条明晰的接受线索，这是中国诗歌发展的重要现象。比较而言，在某些历史时期，中国士人对陶渊明的接受远比对屈原的接受复杂得多。

—

接受美学创始人、德国康士坦茨大学教授汉斯·罗伯特·尧斯（Hans Robert Jauss）曾说，对于一个作家及其作品，“第一读者的理解将在一代又一代的接受之链上被充实和丰富，一部作品的历史意义就是在这过程中得以确定，它的审美价值也是在这过程中得以证实”^[3]。伟大的作家及其作品，作为历史上的一种文化和文学存在，其深刻复杂的内涵，是在历史的发展中，被无数读者不断地认知、阐释、接受而形成的，这个过程是无穷尽的，陶诗的历史存在就体现了这样的过程。朱立元先生曾说：“陶诗对唐代诗人、读者来说，其艺术价值和地位已大为上升，这种作品在历史上的升值（或贬值），自然与那个时代新的审美视界与需求密切相关，唐人就是以他们的‘当代’视界去议论、评价陶诗的。”^[4]在唐代，陶渊明的价值观念、人格精神、生存方式、处世态度及陶诗艺术所蕴含的丰厚而深刻的内涵，是唐代士人以其各自的期待视野不断地进行创造性阅读与阐释而生成的，就此而言，唐代士人实质性地参与了陶渊明及陶诗的存在。同时，唐代士人也把陶渊明的人文精神和陶诗的诗学品格视为重要的精神源泉和艺术生命，贯注到他们的诗歌创作之中，可以说，陶渊明已经实质性地存在于唐代士人心理与唐诗之中了。

本书以唐代诗歌为主要研究对象，采用文本分析的方法，从文艺学、美学、历史学、社会学、哲学、宗教、心理学等层面，

剖析唐代士人接受陶渊明的期待视野，对唐代各个时段的陶渊明接受的总体倾向和线索、唐代诗人接受陶渊明的重点与特点、唐代士人对陶渊明的批评和排斥等问题，进行深入的剖析研究和尽可能准确的描述，以探究唐代士人对陶渊明认知、阐释与认同、接受的过程，发现唐代士人内心深处的陶渊明情结，以及唐诗生命中蕴含的陶诗的艺术细胞，全方位观照陶渊明及陶诗与唐代士人、唐代诗歌及唐代文化之间所发生的深层的复杂关系，进而从文学内部探讨并发现唐代诗歌的生命特质，把握中国文学发展的内在规律。

二

中国士人无论是仕进，还是隐退；无论是执著于儒家思想，还是皈依于道家精神，都对陶渊明情有独钟，往往频频回首陶渊明，试图从他那里找到人生所需要的某种东西：或是精神力量，或是情绪解脱，或是心理安慰，或是品格标榜，等等。对于中国士人，陶渊明是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是可以及时医治精神与心理伤痛的良药。认识陶渊明的影响，研究陶渊明的接受，是透视中国士人心理的一个捷径。

唐代是中国诗歌的黄金时代。中国诗歌的繁盛出现在唐代，不仅是唐代文化高度发展的成就，也是中国诗歌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唐代诗人对前代诗歌艺术传统的全面接受、继承和创新、超越的实绩。从前代诗歌艺术中汲取什么和如何汲取，这两个层面的问题几乎决定了唐诗的质素与品格。在唐诗继承与发展前代诗歌艺术的过程中，陶渊明起了重要作用。陶渊明的人格精神及诗歌艺术给唐诗提供了丰富的文化营养，可以说，陶渊明在士人心理、诗歌品格和诗学境界三个层面参与唐代文化发展的建构。

人们一般把陶渊明的影响与接受分为两期，“唐以前，谓之

深山幽兰，花旁无蹊；唐以后，谓之体被百叶，沾溉万世”^[5]。笔者认为，从陶渊明接受史的角度而言，唐代以前主要是对陶渊明及陶诗的全面认知与阐释时期，唐五代主要是对陶渊明的人格精神与诗歌艺术、诗学品格的自觉接受时期，宋代主要是对陶渊明的哲学思辨时期。

唐代有近三百年的历史，由于各历史阶段的社会文化特点不同，士人对陶渊明的接受也体现出明显的时段性。初唐的陶渊明接受，是从唐前士人对陶渊明及其作品的认知阐释向唐代士人对陶渊明的人格精神与诗歌艺术、诗学品格自觉接受的过渡时期。除王绩对陶渊明切实有效的接受之外，多数士人以陶渊明来标榜高情雅道。盛唐的陶渊明接受则进入了自觉阶段，对陶渊明的人格精神与诗歌艺术、诗学品格的接受形成了第一个高潮。尤其是山水田园诗派诸家对陶诗艺术的汲取，将陶渊明的田园诗艺术提高到更加完美的诗学境界，使山水田园诗艺术达到了一个新高峰。中唐政治文化的复杂变化使士人把陶渊明的人生观、生活态度作为接受重点，把“桃花源”作为调整心态、安顿心灵的精神家园。中唐士人同时又把陶渊明广泛用于酬唱之中，陶渊明接受出现了普遍化、浮泛化、功利化的倾向。晚唐五代是唐人对陶渊明的人格与诗学接受向宋人对陶渊明的哲学思辨的重要过渡时期。晚唐五代士人以隐逸为中心和重点来接受陶渊明，在士人对陶渊明的歌咏中，篱菊、桃源、北窗、五柳等与陶渊明相关的词语，已经发展为成熟的、具有特定内涵的文化意象固定下来，融入中国古典诗歌的话语体系。从中唐开始，陶渊明接受就有了思辨的理趣出现，晚唐五代有更多的士人用理性的哲学眼光来审视陶渊明及隐逸文化，表达哲学意趣与理性感悟，陶渊明接受的理性思辨色彩明显加重了。这引导并开启了宋人在理性层面上思辨陶渊明，为宋人找到了解读、接受陶渊明的新途径。

三

陶渊明及其文学作品的传播是接受陶渊明的必要条件，唐代的陶渊明传播主要有四个途径。

（一）陶集

据专家考证，唐代有两种陶集的手抄本在民间流传，即萧统整理编辑的八卷本《陶渊明集》和阳休之编辑的十卷本《陶潜集》。而有的学者认为陶集还有陶潜生前自定本。

清人陶澍认为陶集有自定本，他说：“是先生（渊明）集必有自录一卷，而沈约云文章皆题岁月者，当是据录之体例而言。至唐初，其录尚在，故李善等依以作注，后乃亡之，遂凌乱失序，无从校勘耳。”^[6]日本学者桥川时雄的《陶集版本源流考》提出反对意见，认为陶集无自定之本，他说：“距陶公卒世未百年之时，陶集既行于世，而有几种本，各有异同，是则为详确之事实，毫不容疑者也。”^[7]

郭绍虞先生的《陶集考辨》是一篇力作，对于陶集自定本的问题，郭先生认为：“陶公生前虽无自定之本，而传写之本则在当时或已有之。其传写之动机，可出于时人之嗜好，亦未尝不可出于陶公之本意。”^[8]承认陶公生前可能有陶集的传抄本。他认为：“大抵梁以前为陶集之传写时期，宋以前为补辑时期，宋代则为校订时期，而南宋已经开注释之风，故入元遂为注释时期。明代则为评选时期，清代则为汇集与考订时期。”^[9]郭先生还考证，梁以前陶集曾流行六卷本（隋时已佚）和八卷本（已佚），两种均可能为传写本。而宋元前陶集有三种流行，即梁萧统编的昭明本（八卷本，已佚）、北齐阳休之编的阳休之本（十卷本，已佚）、南唐本（书名、卷数、编者均不详，已佚）。郭先生认

为：“陶集在宋以前，传抄已行，故诸本互有异同。大抵一定于昭明，再定于阳休之，三定于宋庠，而始有刊本。”^[10]更多学者认为：“在陶渊明生前，陶诗已有抄本传世。……至北宋，又经宋庠重新刊定为十卷本《陶潜集》，这是我们目前所知道的最早刊本。”^[11]

袁行霈先生的《宋元以来陶集校注本之考察》从新的视角对陶集的流传问题作了梳理，对目前尚存的宋元以来的主要陶集版本一一作了详尽的说明和考证，重点考证了各本陶集的异文情况。袁先生认为：“虽然我们尚难肯定陶集必有自定之本，但陶渊明的作品在当时即已流传并产生影响则是可以肯定的。”^[12]

据阳休之《陶集序录》可知，梁代以前，“陶集”有八卷本和六卷本两种，且“梁代以前，陶渊明的作品只是在一部分人中间传抄，没有经过认真的搜集和整理。……梁昭明太子萧统是第一位认真搜集和整理陶渊明作品的人”^[13]。阳休之把当时流传的三种“陶集”即八卷本、六卷本以及萧统整理的八卷本，重新加以整理，合为十卷本“陶集”，并在北朝流传。袁行霈先生认为：“陶渊明的作品在南北朝对峙的情况下竟然传到了北朝，并且受到了北朝人的注意，陶渊明在南北文风交流中起了一定的作用。”^[14]

根据《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等记载，隋唐之际，“陶集”有萧统的八卷本，阳休之的十卷本、九卷本^[15]、五卷本^[16]等多种抄本在流传。

（二）《文选》

萧统选编的《文选》在唐代广泛流传，进而形成了《文选》热，这使更多的士人有机会认识陶渊明，间接地扩大了陶渊明的影响。

在中国文化和文学发展的历史上，《文选》的地位一直是崇高的。“《文选》是文章的祖宗，自两汉而下，至魏、晋、宋、齐，精者斯采，粹而成编，则为文章者，焉得不尚《文选》也。”^[17]《文选》的这种崇高地位就是在初唐奠基的。“《文选》学”始于隋末唐初萧该与曹宪的《文选》研究，两人各撰的《文选音义》均已亡佚。曹宪是唐初大学者，《旧唐书·儒学上·曹宪传》记载：“太宗又尝读书有难字，字书所阙者，录以问宪，宪皆为之音训及引证明白，太宗甚奇之。”^[18]曹宪深为帝王及时人所重。“江淮间为《文选》学者，起自江都曹宪……宪以仕隋为秘书，学徒数百人，公卿亦多从之学，撰《文选音义》十卷，年百余岁乃卒。”^[19]其“所撰《文选音义》，甚为当时所重。初，江、淮间为《文选》学者，本之于宪。又有许淹、李善、公孙罗复相继以《文选》教授，由是其学大兴于代”^[20]。曹宪的高足李善所注的《文选》蜚声学林，集“选学”之大成，而曹宪、李善师徒的工作则是在太宗、高宗的支持下进行的。玄宗开元年间，工部尚书吕延祚召集吕延济、刘良、张铣、吕向、李周翰五人注《文选》，成五臣注《文选》，其成就远不及李善注本。五代时期，《文选》依然为读书人所重视，《文选》学已经成为一门显学。南宋人合李善与五臣两种《文选》注本为六臣注本而合刊，流传至今。穆克宏先生考证“《文选》镂版、行世，大约是在后蜀孟昶广正年间（935—965）”^[21]。所以至宋初，《文选》的刊行本已遍行于海内，“选学”进入了又一个发展时期。

唐人极度重视《文选》。“高宗以行俭工于草书，尝以绢素百卷，令行俭草书《文选》一部，帝览之称善，赐帛五百段。”^[22]武后时期，进士科举考试增加杂文与诗赋的内容，而当时正在兴起的《文选》学恰恰为士人研习杂文与诗赋提供了重要参照。《旧唐书》记载，开元十八年“时吐蕃使奏云‘公主请《毛诗》、

《礼记》、《左传》、《文选》各一部。”制令秘书省写与之”^[23]。看得出帝王和士人对《文选》的重视。在初唐士人的心目中，《文选》是文章的模范，是参加科举考试的必读书目，借此可达应举捷径。

“《文选》烂，秀才半”^[24]，唐代士人无论科举仕进，还是写诗作赋都离不开《文选》。朱熹认为：“李太白始终学《选》诗，所以好。杜子美诗好者亦多是效《选》诗。”^[25]杜甫诗《宗武生日》云：“熟精《文选》理。”其《水阁朝霁奉简严云安》又云：“续儿诵《文选》。”《新唐书·萧至忠传》记载，萧至忠与宋璟对话，两人均随口引用《文选》中潘岳《西征赋》《秋兴赋》的文句。^[26]许多史料证明唐代从帝王到普通士人都极为重视《文选》，士人与《文选》的关系尤为密切，因为《文选》关乎他们一生的命运。

《文选》选入了陶渊明的八首诗作和一篇散文，这些作品是《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挽歌诗·荒草何茫茫》《拟古·日暮天无云》《饮酒·结庐在人境》《饮酒·秋菊有佳色》《读山海经·孟夏草木长》《咏贫士·万族各有托》和《归去来兮辞》。萧统所选的这九篇作品，无论从思想内涵还是艺术品格与价值，都堪称是陶诗的代表作。萧统在《文选》中对陶诗作了较江淹、钟嵘更为全面而深刻的解读，对陶渊明的散文作了前无古人的发现和阐释。

《文选》作为文学范本深受唐人的钟爱，它在陶渊明接受史上有着重大意义。《文选》在士林中的普及和深刻影响，使得陶渊明的影响得以扩大和深入，加强了唐人对陶渊明认知和接受的速度和深度。与此同时，萧统的八卷本《陶渊明集》也广泛地在士人中间传抄，昭明太子那篇精深的、极富哲学意味的、陶渊明接受史上里程碑般的作品《陶渊明集序》，以及附在集中的《陶

渊明传》也必然深深地感动和震撼着唐代士人，使他们能够在道德与哲学的高度认知陶渊明、感悟陶渊明。这同样加速并深化了陶渊明及其作品在唐代的传播，促进了唐代士人对陶渊明的接受。一言以蔽之，在唐人对陶渊明的接受中，萧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功不可没。

（三）类书

初唐时期，文学和学术都取得了很大成就。“一方面把文学当作学术来研究，同时又用一种偏向于文学的观点来研究其余的学术。”^[27]唐初的学术成就之一就是典籍的整理和类书的编纂。我们所要讨论的是类书与陶学的关系。

《大唐新语》记载：“太宗欲见前代帝王事得失以为鉴戒，魏征乃以虞世南、褚遂良、萧德言等采经史百家之内嘉言善语，明王暗君之迹，为五十卷，号《群书理要》，上之。……赐征等绢千匹，彩物五百段。太子诸王，各赐一本。”^[28]《群书理要》即是议论国家政治兴亡的类书。唐代的类书超过历代，根据《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唐会要》等资料记载，初唐时期编撰的类书有《北堂书钞》160卷、《艺文类聚》100卷、《文思博要》1000卷、《累璧》630卷、《瑶山玉彩》500卷、《三教珠英》1300卷、《芳树要览》300卷、《事类》130卷；开元年间编纂的《初学记》30卷，以及稍后的《文府》20卷、私撰的《璧玉芳林》450卷、《玉藻琼林》100卷、《笔海》10卷和中唐时期的《白氏六帖事类》30卷，等等。我们仅就现存的主要的唐代类书虞世南《北堂书钞》、欧阳询《艺文类聚》、徐坚《初学记》和白居易《白氏六帖事类》来考察陶渊明的情况。

虞世南《北堂书钞》引陶渊明事典有三次：^[29]